

# 农户水稻种植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湖南资兴320户农户问卷调查

李 维

(湖南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摘 要:** 基于湖南资兴320例农户水稻种植的问卷调查数据,从一般环境因素、家庭环境因素和个人素质因素三个方面,运用多元有序 Logistic 模型实证分析农户水稻种植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一般环境因素对水稻种植意愿的影响程度最大,家庭环境因素次之,个人素质因素影响最小。具体来讲,农户对稻谷价格评价、生产资料价格评价和种植补贴评价越满意,其水稻种植意愿越高;家庭种植面积越多、家庭收入等级越高和水稻种植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越大,农户水稻种植意愿越高;教育对水稻种植意愿影响的曲线呈倒“U”形。

**关 键 词:** 农户;水稻种植;意愿;一般环境;家庭环境;个人素质;资兴市

中图分类号: F301.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0)05-0007-07

## Peasants' willingness to rice planting and its influential factors:Based on data of Zixing ,Hunan

LI wei

(Management School,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g 411201,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actors about rice planting with multi-order Logistic model, relied on data concerning 320 farmers in Zixing, Hunan. The conclusion is that common environment is the paramount factor, home environment is the less significant factor, and individual state is the lest important factor. In detail, Peasants' willingness to rice planting will increas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ice price, production material price and plant subsidies policy; In addition, it is also in conformity with areas of home growing rice, high level of income, and big rate of rice planting in all income; fuctions of education appears a "U" curve.

**Key words:** peasants; rice planting; willingness; common environment; home environment; individual state; Zixing city

### 一、问题的提出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业问题,而确保粮食生产不下滑已经成为了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政府当前工作的重点,也是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基石。长期以来,水稻是中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因此,考察农户水稻种植意愿的各种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农户水稻种植意愿的决定因素进行深入而细致的数量分析,将会为增加水稻播种面积

和提高水稻产量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关于影响农户水稻种植意愿的决定因素,现有研究往往着眼于外部环境即宏观因素,认为不完善的农村市场经济制度及其形成的稻谷价格、生产资料价格是关键因素。王中美(2008)认为在一个市场经济地位未被西方各国承认的国家,粮农无法控制,也无法预期粮食和生产资料价格,二者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控制,粮食价格低而生产资料价格高导致粮农利润微薄甚至亏本经营<sup>[1]</sup>。陈锡文(2010)研究认为农村市场经济整体滞后,商品市场相对发达而生产要素市场几乎还未建立,如劳动力市场、产权市场、技术市场、金融市场,与水稻种植密切相连的土地流转市场整体上不完善(部分落后地区

收稿日期: 2010-09-09

基金项目: 湖南科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课题

作者简介: 李 维(1984—),男,湖南资兴人,硕士研究生。

甚至还未建立),生产要素市场匮乏等等,这些因素严重制约着农业发展<sup>[2]</sup>。外部因素中,除了粮食价格、生产资料价格,土地也备受关注。王学斌(2007)研究认为农村土地法律残缺引发权、责、利不明,增加了交易成本,减少了农户的农业经营收入,降低了农户种粮积极性<sup>[3]</sup>。现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新通过的《物权法》存在冲突,例如郑清贤(2008)研究发现: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定,在上述法律中存在冲突<sup>[4]</sup>。一些学者认为不是以经济利益最大化而是以经济利益均等化为原则的农村土地分配制度造成了土地零星细碎,难以形成规模集约经营(朱冬亮,2002;廖洪乐,2003;贺铁英,2004;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10)<sup>[5-8]</sup>。

与此同时,许多学者将研究视角转向城乡二元结构。秦辉(2002)、王新志(2010)指出农村居民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土地成为社保替代品;二元结构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扩大,大量农村居民涌向城市,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农村资源流向城市,产生马太效应,严重削弱了农村农业的自身发展能力<sup>[9,10]</sup>。许传新(2010)研究认为农村留守人口主要由老人、儿童和妇女构成,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外出打工,劳力型投资和资本型投资锐减,土地掠夺型粗放型经营,追求速效和短期利润,土地肥力快速下降,很多农地贫瘠,甚至变成荒漠<sup>[11]</sup>。留守人口缺乏足够的人财物,导致农业生产必须的公共品无法充足供应,例如缺乏有效的农田灌溉系统。肖冬华(2009)研究认为城乡二元结构间接导致位置较差或者不便耕种的土地要么被退耕还林,要么被粗放管理,或者直接撂荒<sup>[12]</sup>。王安春(2006)认为城镇化水平低,消费空间狭小,粮食供过于求,粮食上涨空间有限,对增加农民收入潜力不大,难以有效刺激粮农种粮积极性<sup>[13]</sup>。

近年,国家对“三农”问题愈加重视,相继出台政策支持农村农业发展,引起众多学者密切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10)研究认为提高水稻收购价格能增加粮农收入和提高粮农种粮积极性<sup>[8]</sup>,但也有

学者持相反观点(刘克春,2007,2010)<sup>[14,15]</sup>。很多学者认为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提高了粮食产量和增加了粮农收入(钱克明,2003;曹芳,2005)<sup>[16,17]</sup>,但也有学者认为补贴过于分散,补贴标准过低,补贴方式和补贴环节不完善,效果甚微,需进一步完善(王蛟、肖海峰,2006;马文杰、冯中朝,2007;朱红根、翁贞林、陈昭玖,2010)<sup>[18-20]</sup>。周诚(2010)认为农业是十分突出的“特殊弱质产业”、“先天性困境产业”,应该给予更多的政策倾斜<sup>[21]</sup>。

在以往的研究基础上,笔者拟在考虑外部环境—宏观因素的同时,重点关注水稻种植的家庭与个人因素,即分析农户水稻种植与否的微观因素。

##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描述

### 1. 模型构建

参考粮食,特别是水稻种植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结合农户行为的自身特征和数据获得的可能性,笔者拟从一般环境因素、家庭环境因素和个人素质因素三个方面,通过对湖南资兴农户水稻种植的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农户水稻种植的影响因素,但侧重于微观基础分析。

(1) 一般环境因素。一般环境因素指对农户水稻种植有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当地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等,这些环境因素的好坏较大程度上影响农户水稻种植的成本和收益,并最终影响种植的面积。有时,一般环境因素对农户种植具有决定性影响。即使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宏观层面的体制结构也在较大程度上制约着农户对种植决策的选择。如正逐步弱化城乡二元结构,但其影响仍然深远;农村水利基础设施落后,自然灾害频繁;公路等交通设施落后,运输成本高昂,或者农产品被迫只能在本地市场出售;信息沟通渠道有限,市场信息难以得到及时响应,“看不见的手”部分失灵;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保障水平相对教低,农户有后顾之忧。这些都显著地增大了农户种植成本与风险。但是鉴于上述因素难以量化,而它们与地域差异程度相关,可以地域差异程度作为替代变量。笔者将受访农户按离资兴市中心城区的远

近分为“近郊”、“远郊”，“近郊”指资兴市东江镇文昌村和星红村，“远郊”指资兴市兴宁镇山海村和海水村、资兴市三都镇三都村和中田村。用虚拟变量来表示地域差异程度，其中，“近郊”为 1，“远郊”为 0。并且假设，越是“近郊”的农户更有可能种植面积更大的水稻或者更少的耕地被抛荒，反之，“远郊”农户种植面积少或者耕地直接被撂荒。另外，稻谷价格、生产资料价格和粮食补贴等是农户无法控制的重要外部环境因素，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户水稻种植的收益和成本，或者说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户水稻种植的意愿。因此，它们在模型中也应成为关键组成部分。

(2) 家庭环境因素。家庭是农村社会的最基本单元。家庭环境因素指与农户水稻种植直接相关的家庭条件，主要包括家庭人口、家庭劳动力、家庭承包耕地面积、家庭水稻种植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家庭收入等级等等，这些因素对农户水稻种植决策存在重大影响。家庭全体成员共同做出水稻种植与否的决策，是整个家庭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一般而言，家庭劳动力多、耕地承包面积大、水稻种植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水平高，更有利于播种更大面积、获得高产量和增强水稻种植意愿。即拥有更多劳动力和资金意味有能力在当地承包大面积土地，但同时也有能力在当地从事报酬率高的非农产业，具有双重效应。家庭水稻种植份额是家庭水稻经营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反映农户对水稻种植的依赖程度，一般而言，依赖程度越高种植意愿越强。

(3) 个人素质因素。个人素质因素直接影响到农户水稻种植的收入和成本，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接受学校正规教育年限、是否是村干部、是否是党员、是否参加过种植培训。水稻种植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浸种、播种、插秧、开花成熟、收割、晒干和清理干净、出售，整个流程是个繁杂精细化作业管理过程。在体力上，男性比女性更占优势，但随着水稻生产过程逐步机械化，优势逐步减弱，例如，除了田间除草和灌水等，基本不存在体力活；但也有例外，对于喷洒农药频率高（在调查中农户反映，一般而言喷洒农药是每一个或二个星

期一次，但有时如开花时期，每星期喷洒二次，或更多）且对身体危害大、甚至经常中毒的田间作业，女性特别是年轻女性大多不愿从事，一般是男性来完成。总体而言，男性略占优势。随着年龄的增长，积累了更多的水稻种植管理经验，更有利于降低风险、获得低成本和高收益，但同时年龄增大将导致体力下降、疾病增多，总体而言，年龄增大有利于提高水稻种植意愿。一般假设接受学校正规教育年限与水稻种植意愿成倒“U”形，即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农户更有可能外出打工，离开农村农业，寻找更好的发展前景；小学文化及以下学历的农户不仅缺乏必要的农业生产技能而且缺乏学习新技能的能力，例如各种机械操作和保养、新水稻品种栽培技术，这类农户倾向于在当地小镇从事简单体力活；学历处于两者之间的农户倾向于从事农业生产。村干部身份对水稻种植意愿有正面影响，原因是村干部一般为熟悉农业生产的领头人物、技术能手。在二元结构和“身份社会”的背景下，党员身份意味着丰富的社会阅历，可能对农户种植意愿产生影响。理论上，参加过种植培训的农户应该更愿从事种植生产，但培训效果褒贬不一。本文所用各个控制变量的具体特征与解释详见表 1。

本文被解释变量即因变量农户水稻种植意愿，是非连续有序变量，农户可在“没有意愿，即承包地没有种植水稻或土地全部撂荒”、“中度意愿，即只有少量承包地种植或大部分土地撂荒”和“高度意愿，即全部承包地种植水稻或没有任何承包地撂荒甚至耕种其他家庭承包地”三种情况之间做出选择。因变量为非连续有序变量，取值的方法为：当农户回答“没有意愿”时取值 0；回答“中度意愿”为 1；回答“高度意愿”为 2。笔者采用多元有序 Logistic 模型进行分析，其模型形式表示如下：

$$\ln\left[\frac{p(y \leq j)}{1 - p(y \leq j)}\right] = a_j + \sum_{i=1}^k \beta_i x_i, j = 1, 2 \quad (1)$$

等价于：

$$p(y \leq j | x_i) = \exp(\alpha_j + \sum_{i=1}^k \beta_i x_i) / [1 + \exp(\alpha_j + \sum_{i=1}^k \beta_i x_i)] \quad (2)$$

表1 模型所使用控制变量及其解释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解释	预期影响
一般环境变量	地区类型	近郊=1, 远郊=0	+
	稻谷价格评价	满意=1, 不满意=0	+
	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价格评价	满意=1, 不满意=0	+
	种粮(水稻)补贴评价	满意=1, 不满意=0	+
家庭特征变量	家庭人口	一个户口且经济关系也在一起的人口数	+
	家庭劳动力	家庭中男性年龄在16-65岁之间的人数加上女性年龄在16-60岁之间的人数	+
	收入等级	目前, 家庭收入水平在村里属于: 上等=5; 中上等=4; 中等=3; 中下等=2; 下等=1	+
	水稻经营份额	2009年水稻经营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	+
	水稻种植面积/亩	家庭水稻种植面积	+
个人特征变量	性别	男=1; 女=0	+
	年龄	周岁	+
	受教育程度	接受学校正规教育年限	?
	是否是村干部	村干部=1; 非村干部=0	+
	是否是党员	党员=1; 非党员=0	+
	是否参加过乡镇种植培训	参加过=1; 没参加过=0	+

(1)式、(2)式中,  $y$  为农户承包地水稻种植状况, 分为3个等级, 分别用0、1、2表示;  $x_i$  为  $k$  个影响农户承包地水稻种植的自变量;  $\alpha_j$  为截距参数,  $\beta_i$  为回归系数。

## 2. 数据描述

(1) 样本分布。水稻主产区在南方。水稻是湖南省资兴市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高、总产量最多的粮食作物, 笔者选取其作为样本调查点具有代表性。为了定量分析农户水稻种植意愿影响因素, 2010年5月, 笔者以水稻产量为抽样标准, 将各县(区、市)的乡镇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 从三个层次中各抽取1个被调查乡镇, 再从每个乡镇中抽取2个被调查行政村, 然后根据被调查行政村村民名册等距离抽取60个样本农户, 样本农户必须是样本村居民且每个家庭只随机抽取一个样本, 由于调查时间是五一节假期间, 样本包含常年外出打工农民。总体而言, 调查涉及面广, 基本上涵盖了农村各个年龄段、各种不同职业群体, 具有代表性。其中, 在资兴市近郊东江镇文昌村和星红村抽取了120个样本, 东江镇水利资源丰富水稻种植条件优越属于水稻高产区; 在资兴市远郊兴宁镇山海村、海水村抽取了120个样本, 兴宁镇水稻种植条件不及东江镇属于水稻中产区; 在资兴市远郊三都

镇三都村、中田村各抽取了120个样本, 三都镇土壤贫瘠水稻种植条件较差属于水稻低产区, 在调查访问期间, 该镇个别农户打算异地搬迁, 例如搬迁到东江镇。计量分析研究涉及的每个变量都没有缺失值才能被纳入到计量模型中, 本文研究涉及的变量较多, 交叉筛选后, 最终进入本文分析模型的有效样本为320个(表2)。

表2 被调查农户地区分布

地区		农户/个	占比
东江镇	文昌村	52	16.2
	星红村	56	17.5
兴宁镇	山海村	54	16.9
	海水村	50	15.6
三都镇	三都村	50	15.6
	中田村	58	18.2

(2) 数据特征。笔者利用上述320个样本农户的问卷调查, 把样本分为三类进行模拟: 第一类为“总体”(全部样本), 第二类为“远郊”, 第三类为“近郊”, 旨在分析相关因素对不同地区农户水稻种植影响的差异。该三类样本变量特征见表3。经分析得知, “远郊”和“近郊”没有显著差别, 因此在模型估计时把“远郊”和“近郊”当成一个整体加以处理。

表 3 影响水稻种植因素的特征值

解释变量	总体		远郊		近郊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性别	0.787 5	0.409 7	0.787 7	0.409 8	0.787	0.411
年龄	43.637	10.295	43.933 9	10.321	43.055	10.26
受教育程度	8.006	3.825	7.6273	3.964	8.75	3.434
是否是村干部	0.090 6	0.287 5	0.089 6	0.286 3	0.092 5	0.291 2
是否是党员	0.134 3	0.341 5	0.117 9	0.323 2	0.166	0.374 4
是否参加过种植培训	0.090 6	0.287 5	0.089 62	0.286 3	0.092 5	0.291 2
家庭人口	3.575	0.906 6	3.599 0	0.915 6	3.527 7	0.890 8
家庭劳动力	3.162 5	0.956	3.207 5	0.953	3.074 0	0.973 51
收入等级	2.862 5	0.799 5	2.806 6	0.732 0	2.972 2	0.911 5
水稻经营份额	0.510 6	0.339 8	0.527 87	0.334 3	0.478 5	0.349 39
水稻种植面积	2.14	2.26 5	2.043 86	2.039 3	2.328 7	2.65 39
稻谷价格评价	0.706 2	0.456 1	0.71226	0.453 7	0.694 4	0.462 7
生产资料价格评价	0.3	0.458 9	0.264 15	0.441	0.370 3	0.485 15
种粮补贴评价	0.706 2	0.456 1	0.716 9	0.451 5	0.685 1	0.466 6
地区类型	0.337	0.473 5	0	0	1	0

注：①各变量的样本数量为“总体”320个，“远郊”212个，“近郊”108个；②在320个调查样本中，“承包地全部撂荒”样本为53个（其中“近郊”为22个，“远郊”为31个），“承包地部分耕种”样本为191个（其中“近郊”为134个，“远郊”为57个），“承包地全部耕种”样本为76个（其中“近郊”为29个，“远郊”为47个）

### 三、模型估计结果与解释

本文运用 Eviews5.0 软件对 320 个样本进行了多元有序 Logistic 模型处理，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个体异方差的影响，笔者运用 White 异方差一致协方差估计量进行了校正。在处理过程中，首先将所有对因变量有影响的自变量都引入模型进行显著性检验(结果见模型一)，然后根据检验结果，在一个或多个不显著的变量中，将 z 检验值最小的那个变量剔除再重新拟合回归方程，并进行各种检验，直到所保留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都通过显著性检验为止(结果见模型二)。具体的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4，模型一和模型二的 LR 统计值分别为 514.052 5 和 497.819，均高度显著，表明模型的模拟效果良好，应拒绝回归系数均为 0 的假设。

(1) 个人特征变量对水稻种植的影响。在个人特征变量中，年龄通过模型一的显著性检验且符号为负，表明年龄越大种植水稻意愿越小，甚至抛荒不予种植，主要原因在于水稻种植过程中部分作业实现了机械化，但并非所有作业都实现了机械化，例如喷洒农药、施肥等环节仍是高强度且高频率体力活，年纪过大，一般超过 70 岁，无法再从事水

### 稻种植。

表 4 影响水稻种植因素的多元有序 Logistic 模型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回归系数	z 统计量	回归系数	z 统计量
性别	1.210	1.373	-	-
年龄	- 0.078*	- 1.700	-	-
受教育程度	0.226*	1.874	-	-
受教育程度的平方	- 0.023 1*	- 1.725	-	-
是否是干部	2.382	1.033	-	-
是否是党员	- 0.772	- 0.729	-	-
是否参加过种植培训	1.682	1.093	-	-
家庭人口	0.272	0.423	-	-
家庭劳动力	- 0.448	- 0.731	-	-
收入等级	0.976*	1.713	-	-
水稻种植面积	1.405***	5.090	1.598***	6.759
水稻经营份额	11.928***	4.788	9.660***	5.778
种粮补贴评价	1.549*	1.820	-	-
生产资料价格评价	2.425**	2.932	1.703**	2.576
稻谷价格评价	2.389**	2.288	2.806***	3.026
地区类型	0.048	0.073	-	-
截距 1	4.004	1.317	2.710***	5.508
截距 2	18.602***	4.815	15.801***	8.251
最大似然比 ( LR statistic)	514.052 5***		497.819***	
伪 R <sup>2</sup> (Pseudo R <sup>2</sup> )	0.847		0.821	

注：①\*、\*\*和\*\*\*分别代表通过了 10%、5% 和 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②“总体”样本为 320 个，其中“近郊”为 102 个，“远郊”为 218 个

受教育程度通过模型一的显著性检验且符号符合理论预期,说明受教育程度与农户水稻种植意愿关系的曲线呈倒“U”形,即接受过中专及以上教育的农户水稻种植意愿很低,只接受过小学教育的农户其意愿也很低,介于两者之间的初中、高中农户意愿很高。其主要原因与目前农村水稻种植风险有关,小学文化者难以控制风险;中专及以上文化者意识到相对于非农产业,农业风险太大且报酬率太低;初高中文化者认为农业风险可控且相对于其它简单的体力工作,报酬率较高。

农户是否村干部、是否是党员、是否参加过种植培训和男女性别对水稻种植意愿没有显著影响,说明村民是村干部、或者党员、或者参加种植培训、或者男性,无法提高其水稻种植意愿。原因在于村干部与水稻种植能手没有必然联系,虽然成为水稻种植能手能增加竞选者的成功概率,但竞选成功更多的是依赖于财力和人脉,或者说整个家庭资源、甚至家族资源,这与目前复杂的农村村庄治理相一致;是党员并未给水稻种植带来优势;种植培训对水稻种植效果甚微,可能由于培训中实用技术少,或者参加培训的农户太少,政府应改进培训方式和内容;性别与预期判断不符,可能是机械化的大规模使用,或者女性采取了必要防卫措施,例如穿戴喷洒农药的专业服,或者采用性能更稳定的喷洒设备,弱化了性别劣势。

(2) 家庭特征变量对水稻种植的影响。在家庭特征变量中,收入等级在模型一中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符号为正,表明提高收入能增强水稻种植意愿,原因在于收入高意味着将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提高机械化水平,雇用更多的劳动力,增加施肥量和农药喷洒次数,从而达到高生产率,或者规模生产,反过来提高了收入。收入高和水稻种植意愿强呈现出双向良性互动关系。

水稻种植面积和水稻经营份额在两个模型中都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提高农户水稻种植面积和经营份额会提高其水稻种植意愿,原因在于大面积种植可以引进先进技术,减少种植风险,进而实现规模经济;而水稻经营高份额可以集中人力、财力、物力从事水稻种植,使其经营专业化;二者都可以提高农户收入,增强其种植

积极性,最后促使水稻种植专业农户的产生。

家庭人口或者家庭劳动力对水稻种植没有显著影响,说明家庭人口多或者家庭劳动力多并不能提高水稻种植意愿,与预期不相符合,其原因在于目前的土地分配制度,即人口多的大家庭往往能获得数量较大的耕地面积,但分配土地细碎,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且人口多的大家庭整个家庭负担重,仅仅依赖于水稻种植难以维持必要支出,如小孩上学、家庭成员看病等,必须要有部分家庭成员外出打工获得额外收入,导致实际在家务农成员较少。

(3) 一般环境变量对水稻种植的影响。在一般环境变量中,地区类型变量在两个模型中都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相对于远郊农户,近郊农户未能显著提高水稻种植意愿。原因可能在于样本的空间分布,在调查的6个村庄中,都实现了公路“村村通”,并且每个家庭都至少拥有一部手机。伴随着城乡一体化、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近郊与远郊地域差异带来的发展差异逐步弱化。

种粮补贴评价只在模型一中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并且符号为正,说明农户对种粮补贴越满意,其水稻种植意愿越强。原因在于种粮补贴直接增加了粮农收入,提高了种植积极性。这与已有研究观点相符合(钱克明,2003;曹芳,2005)<sup>[16,17]</sup>。在调查的320个样本中有226个表示满意,约为70%,在这226个农户样本中,75个完全种植没有任何抛荒,150个部分种植,1个完全抛荒。广大农户均表示,如果国家不实行种粮补贴,种粮几乎无法获得平均收益。

稻谷价格评价在模型一和模型二中分别通过了5%和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并且符号为正,这符合预期。表明农户对稻谷价格越满意,其水稻种植积极性越高,原因不言而喻,更高的稻谷价格意味着更高的收入,特别是对种粮大户或者高度依赖于水稻收入的农户。生产资料价格评价在两个模型中都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符号为正,说明农户对生产资料价格越满意度,农户水稻种植积极性越高。原因在于,除了自身劳动力外,种子、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是农户水稻种植的最大投入。适度控制生产资料价格是农户从事水稻种植的关键因素。

#### 四、结论

在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下,一般环境因素对农户水稻种植行为的影响最大,家庭环境因素次之,个人素质影响最小。具体而言,稻谷价格评价、生产资料价格评价和种粮补贴评价对农户水稻种植与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三种评价越满意,农户水稻种植意愿越高;家庭水稻种植面积越多、水稻占家庭收入份额越大和家庭收入越高,农户水稻种植意愿越高;农户受教育程度与水稻种植意愿关系的曲线呈倒“U”形,年龄越大,种植意愿越低。其他因素如家庭人口、家庭劳动力、水稻种植培训,影响较小。

上述实证研究结论暗含了三个层面的政策含义:第一,政府应优化外部环境。优化外部环境是促进农户水稻种植的根本举措。坚持积极且稳定的稻谷价格政策,坚决遏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势头,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粮食补贴政策,加大对种粮大户的政策扶持,提高农户水稻种植收入,增强其水稻种植意愿。第二,政府应优化家庭环境。家庭环境是促进农户水稻种植的重要条件。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政策,使得土地实现向大户转移与规模经营。提高水稻种植专业化程度,促进集约经营,有利于水稻产业的良性循环。第三,加强基础教育,在农村力争普及高中教育,培育人力资本是促进农户水稻种植的核心内容(尤其是欠发达地区)。政府应加大农民培训力度,着眼于农户急需的培训项目,改变目前农村人力资源困乏局面;同时,政府应鼓励农村人口城镇化,降低农村人口比例,为规模经营创造条件。

#### 参考文献:

- [1] 王中美. 对华反倾销的历史演变与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J]. 世界经济研究, 2008(9): 11-15, 31, 87.
- [2] 陈锡文. 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形势与“三农”面临的挑战[J]. 中国农村经济, 2010(1): 4-9.
- [3] 王学斌. 农村土地抛荒现象与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J]. 中国经济, 2007(3): 53-60.
- [4] 郑清贤. 略论我国有关土地的现行规定与《物权法》的冲突[J]. 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 2008(4): 39-40.
- [5] 朱冬亮. 土地调整: 农村社会保障与农村社会控制[J]. 中国农村观察, 2002(3): 14-21, 28, 80.
- [6] 廖洪乐. 农村承包地调整[J]. 中国农村观察, 2003(1): 46-54, 81.
- [7] 贺铁英. 人口增长与土地调整的关系: 一个理论推导[J]. 中国农村观察, 2004(4): 31-36, 80.
- [8]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 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09—2010)[M]. 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45-46.
- [9] 秦辉.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与农民权利保障[J]. 探索与争鸣, 2002(7): 15-18.
- [10] 王新志.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全国县域发展与城乡一体化研讨会暨社科院农经研究网络大会”综述[J]. 中国农村经济, 2010(1): 92-96.
- [11] 许传新. 学校适应情况: 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的比较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 2010(1): 76-86.
- [12] 肖冬华. 耕地抛荒问题研究[J].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 2009(1): 25-30.
- [13] 王安春. 农户耕地抛荒问题探析[J]. 宁夏党校学报,

- 2006(3) : 83-85 .
- [14] 刘克春 . 农户农地使用权流转决策行为研究——以江西省经验[M] . 北京 : 中国农业出版社 , 2007 .
- [15] 刘克春 . 粮食生产补贴政策对农户粮食种植决策行为的影响与作用机理分析——以江西省为例[J] . 中国农村经济 , 2010(2) : 12-21 .
- [16] 钱克明 . 中国“绿箱政策”的支持结构与效率[J] . 农业经济问题 , 2003(1) : 41-45 , 80 .
- [17] 曹 芳 . 粮食主产区粮食补贴改革研究——以江苏省的调查为例[J] .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2005(03) : 40-43 .
- [18] 王 蛟 , 肖海峰 . 中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效果评价[J] . 中国农村经济 , 2006(12) : 4-12 .
- [19] 马文杰 , 冯中朝 . 国外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及启示[J] . 经济纵横 , 2007(21) : 67-69 .
- [20] 朱红根 , 翁贞林 , 陈昭玖 , 等 . 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愿意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 619 个种粮大户调查数据[J] . 中国农村经济 , 2010(2) : 22-32 .
- [21] 周 诚 . “农业解困律”概论[J] . 中国农村经济 , 2010(3) : 55-59 .

责任编辑: 李东辉